

林语堂研究丛书

老近幽默大师

主编 陈煜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语堂研究丛书

老近幽默大师

主编 陈煜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近幽默大师 / 陈煜斓主编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004-7453-1

I. 走… II. 陈… III. ①林语堂 (1895—1976) —人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②林语堂 (1895—1976) —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825. 6—53 I206.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126 号

策划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 com)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2.25 插 页 2

字 数 55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复兴

2007年12月5—8日，漳州师范学院在漳州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举办了“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提交了70多篇论文、10余部专著和文献资料编著，漳州师范学院学者的4部林语堂研究专著也在研讨会上首发。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如何坚守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建设开放和谐的民族文化。因此，新世纪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也必须有一个新的战略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研究为我们新世纪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切入点。林语堂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可以说融会中西、和谐共进是他文化理想。他以独特的智慧、卓识、才华、情怀，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学者、作家和文化使者。

林语堂是从闽南走向世界的，在林语堂的家乡漳州召开“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林语堂诞生和出发的地方开始研究林语堂现象，追踪林语堂的文化轨迹，标志着我们对林语堂有了更深切的理解。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在林语堂身上体现着某种民族文化新发展的可能性，这是我们从闽南文化入手研究林语堂的重要意义。为了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为了建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林语堂。学术的林语堂研究已获较多成果，但我们还是力求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重新认识文化的林语堂。

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走近林语堂”。在林语堂的家乡“走近林语堂”，意味着，我们将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去理解林语堂，还原一个更为真实鲜活的林语堂，还原一个曾经生活在我们之中的学者、作家、思想者、文

化人的林语堂。我想，这是我们更为深入真切地研究林语堂的重要基础和起点。

从漳州走出去的林语堂是世界的。这次研讨会我们不仅有海外学者参与，更有专文介绍海外的“林学”，可以说，这是海内外学者在林语堂研究方面的大会师。

从漳州走出去的林语堂是文化的。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中西文化有较为全面、真切的体会，主张中西文化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发展更为理想的人类文化。在他的创造性的文化介绍中，体现出一种明慧达观、宽宏和谐、独立自由、通情达理的理想文化人格。这次研讨会，许多学者从林语堂的宗教信仰、政治情怀、民族情感、文化立场等不同角度切入，研究阐释林语堂的人生观、文化理想，由此，林语堂的人格光芒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

从漳州走出去的林语堂是文学和学术的。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著述甚丰，其作品具有持久的魅力，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奇异的色彩。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能绕开林语堂。对他的作品做进一步的解读，重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仍是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工作。林语堂在语言学等方面的成就也是显著的，本次研讨会不少学者在这些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从漳州走出去的林语堂是矛盾的。他说自己是“一团矛盾”。70年来，对林语堂的评说也是矛盾重重的，这给我们留下诸多研究的空间，在这本论文集中，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研究林语堂，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探索一个“圆形”的林语堂方面有所突破和拓展。

从漳州走出去的林语堂是和谐的。林语堂的宗教思想，林语堂的关于人类文化的理想是耐人寻味的，它典型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中的探寻和思考，他在那段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的内心与行为之间的和谐的追求，十分难能可贵。在当下的文化情境中继续探讨林语堂的信仰和文化理想，提出更为合理、近情的阐释，对构建人类和谐文化很有意义。

从漳州走出去的林语堂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对林语堂研究进行再研究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一个覆盖海内外的“林学”已初见端倪。这将促进我们在更高水平上展开对林语堂的研究。

这次研讨会是一次空前的学术盛会，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林语堂

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次研讨会表明，中国的林语堂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自由发展的空间。为了展现这次会议的成果，我们编印出版本论文集，它不仅烙下了我们在林语堂研究方面前进的印记，也将为我们今后在这方面的更高期望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多元的文化空间，我们追求和谐，建设和谐。和谐与发展是我们的社会理想，也是我们的文化理想。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林语堂，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林语堂，他的追求与努力，正是我们走向这个理想窗口的一个合适的参照。

(151) 韩兴林	论林语堂对基督教——这种主义已臻思辨全
(281) 王蒙	林语堂与基督教——中堂林放
(301) 李静生	论林语堂对基督教——堂林
(302) 卢小平	林语堂对基督教——“封基”封林
(318) 魏书生	林语堂对基督教——堂林
(322) 林海	林语堂对基督教——堂林
(333) 朴鹤善	林语堂对基督教——堂林
目 录	
论林语堂的宗教文化思想与文学创作	刘 勇 杨 中 志 (1)
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	徐志啸 (13)
林语堂之于白璧德主义的意念沼泽现象	朱寿桐 (20)
他者的反叛	刘 勇 杨 中 志 (2)
——林语堂与萨义德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同	
途径的选择	李 勇 (28)
从鲁迅和林语堂讨论“打落水狗”说开去	易竹贤 (40)
“半在尘世半为仙”: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罗昌智 (48)
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化	
——林语堂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的思想检讨	陈煜斓 (62)
现代性语境中林语堂革命观的变迁	陈灵强 (78)
林语堂与梁实秋美学观念之辨异	俞兆平 (88)
林语堂论人与自然的和谐	赵怀俊 (99)
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与超越	
——林语堂小说创作论	张全之 杨新刚 (108)
论林语堂的中国古代小说观	吕贤平 (122)
林语堂与《浮生六记》及老庄哲学的文化塑形	胡明贵 (133)
论林语堂对中国古代侠义文化的两次“翻译”	赖勤芳 (148)
论林语堂的幽默文学观	谢昭新 (158)
林语堂的幽默阐释法	沈金耀 (163)
胸中自有青山在 何必随人看桃花	刘长林 人更主《云山集》

——林语堂写作观探询	杜兴梅(174)
全球化想象与文化怀乡	
——对林语堂中西文化综合观的考察	陈家洋(183)
林语堂：跨文化对话中的解读	庄伟杰(193)
异教徒？基督徒？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选择	李小平(205)
林语堂：中国式的生命本位意识	任毅(214)
略论林语堂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	段榕(220)
林语堂：散文“个人化”的先行者	范培松(228)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林语堂	黄万华(237)
林语堂身份叙述与文学史建构维度	鲍焕然(244)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历史形象	
——以林语堂为例	颜同林(256)
论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创作语境与读者接受的	
变化及对当下的启示	章敏(265)
隐喻的《奇岛》	
——林语堂的“乌托邦”在中国文学中的意义	高鸿(275)
林语堂、许地山、杨骚三作家合论	叶振忠(285)
晓风堂上语，残月林家诗	
——林语堂诗歌论略	毛翰(296)
谄媚特定接受者与非经典性	
——关于《京华烟云》小说与电视剧的同质性分析	刘可可(314)
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	
——以《子见南子》和《孔子的智慧》为中心	孙良好 邢娟妮(323)
殊途与同归：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从对“母性形象”的塑造解读林语堂、赵树理	
小说之传统观	朱凌(333)
林语堂《中国传奇》的“传奇”表达策略	郑礼矩(342)
晚年林语堂文学的原乡文化修辞	李诠林(352)
林语堂的人生品味与文学人物	
——以《京华烟云》主要人物为例	孙疏影(361)

《京华烟云》与中国民俗文化.....	苏永前 汪红娟(368)
Moment in Peking(《瞬息京华》)英汉对比研究	
——汉语国俗词语的英译方法.....	胡勇强(378)
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阐释	
——以林语堂译介的《浮生六记》做个案分析.....	许春翎(391)
林语堂《论语》英译与跨文化阐释.....	李冰梅(402)
重译林语堂.....	吴慧坚(409)
林语堂《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之文本选择与	
编译策略.....	李 平 洗景炬(417)
林语堂语言研究及其成就述评.....	李 申(429)
林语堂的“高地方言学观”浅谈	
——拜读先生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 观察点》	杨秀明(436)
林氏刊物的流风余绪	
——以上海沦陷区散文期刊为例.....	吕若涵(442)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半世纪的酝酿	张陈守荆(454)
从《中国新闻舆论史》看林语堂的新闻审查观.....	王 海 何洪亮(458)
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	
——试论林语堂的文化传播策略.....	沈艺虹(466)
海外“林学”的风景	
——以余英时的论述为中心	冯 羽(475)
林语堂研究历程扫描.....	杜运通(481)
浅谈万平近对林语堂研究的贡献.....	萧 成(491)
解读“幽默大师”：“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桂兴(497)
后记.....	(507)

伯爵董。卿源挺受未兆在昔兵敵人……，消息玄旨卿首寄託义王于怀人，心出并遗出文志斯合立堂而朴，早 600T”。前文指浪氏春山弔宝鼎禮非但界尊號，“浪升”尚升為變，且謙，浪升即贈其好號又，惟《龍興堂集》謙，“人臣尊宗名取之於此，一望”。局自同破壞，地名“成士人所共慕”式國略雷平于括，人臣自起米爾”。“更添伯時賦，內閣新雖仍直升我領與合林一観采伐漢五向一，帝生主始惡凶怖一星出仲同，尊主伯身善怖一星人面，界掛頭發个一星界掛个真多不懼神而都數掛相會挂類人；尊悲掛相音而最央掛相音主人。夢思齒陳掛殊宿家，慈善代謝掛工細掛公職，恨背

◎ 刻 勇 杨 志

朱苗頃令致君掛人向不平空是督大“拂谷振以伊吉莫如蒙公計音五，代玉，善宗不泊遵本类人呼会挂类人”，鄭猶改變其事，恐效和一不重相固而量劍許因頂，白素如睡賈濟繁略半十歲副掛遇調左”奋矣強主人曉怒井掛音人神的少文難深極其已厥主人朗堂靜林，伊始口言，“厥主人”咱堂吾林文

有关林语堂的研究，迄今已有数十年，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过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在融会中西文化，尤其是向西方译介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而对于其创作中接受和融合东西方宗教文化的独特价值，缺乏比较深入的开掘。但是，宗教文化对于林语堂是有着极其独特的意义的，是贯穿他一生的重要问题。他的文化思想、人生信仰及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都与宗教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忽略这一点，而泛泛地讨论其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贡献，可能会遮蔽林语堂作为一个复杂的作家兼思想家的独特价值。

1939年，林语堂在创作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同时，写过一篇长文《我的信仰》^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大体上我可以说：在我们的脑筋里上帝是愈来愈伟大，人是变得愈渺小，而人的躯壳即变得愈纯洁，灵魂不灭的观念却亦愈模糊了。因此与信仰宗教有关的重要概念，如上帝、人类、罪恶，及永生（或得救）均得重新加以检讨。”“真诚的基督徒惶惑不安了。新的真理总是使人不安的，正如突如其来的亮光总使我们的眼睛觉得不舒服一样。……旧的宗教的外形是变迁至模糊了，然宗教本身还在，即将来也还是永远存在的，此处所谓宗教，是指游于感情的信仰，基本的对于生命之虔诚

^① 林语堂：《我的信仰》，《林语堂文集》第9卷，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441页。

心，人对于正义纯洁的确信之总和。……人的灵性亦并未受到影响。道德的境界乃非物理定律的势力所能及的。”1966年，林语堂在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语堂随笔》时，又将这段话加以扩充、修订，变成该书的“代序”，定题为“我的人生观”。在此，他强调自己“是一个天性深喜研究宗教的人”，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以及对于宇宙和上帝，一向在竭力采取一种合理的并在可能范围内，调和的态度”。“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好的世界，而人是一种善良的生物，同时也是一种凶恶的生物。人生有时很快乐而有时很悲惨；人类的社会有时很残酷而有时则不乏真正的善意，知道了这种情形，那么我们除了用格外善意、宽裕和讽刺的思想之外，还有什么旁的良法可以进行呢？大智慧在于不向人性作过分的苛求，而同时也一味放纵，使其变为腐败。”“人类社会和人类本性的不完善，正使我感到人生的兴奋。”这两段相隔数十年却紧密贯通的表白，可以看做是林语堂的“人生观”，它们说明：林语堂的人生观与其对宗教文化的体认有着直接关联。把握林语堂接受宗教文化的思想轨迹，乃是我们理解林语堂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点。

1938年，林语堂在国外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虽然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并曾自许“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可以传世”^①，但真正能显示并代表林氏思想和艺术特质的作品主要还是他自称为“林语堂的三部曲”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朱门》，其中又尤以《京华烟云》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

《京华烟云》首先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似乎这本书全然是以庄子的道家哲学思想为指针的。该书三部，每部皆以一段庄子语录为题旨：

第一部《道家的女儿》所引《大宗师》一段：“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第二部《庭院的悲剧》所引《齐物论》之一段：“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第三部《秋之歌》所引《知北游》之一段：“……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且不说《庄子》这几段话本身令人费解，而更为令人费解的是林语堂为

^①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文集》第8卷，第387页。

何要引用庄子的这几段话。尽管有人评论《京华烟云》“全书受庄子的影响；或可说庄子犹如上帝，出三句题目教林语堂去做”^①；“全书以道家精神贯穿，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②；但是实际考察这部作品的内涵，它并非完全是按照庄子的思想去“尽致”、“发挥”的，甚至与庄子的这些思想相去甚远。而林语堂本人却一方面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另一方面又标明“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③。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在笔者看来，虽然林语堂的宗教文化思想非常繁杂，但总体来说有两个基本构成：一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思想，一是混合了儒家文化成分的道教文化思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林语堂的文化思想趋于平稳、成熟的阶段，他自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故于“四十以上之时”，“久蓄志愿”之后，方着手写作“非意出偶然”。^④ 在这一时期，他接连创作了一系列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京华烟云》（1939）、《风声鹤唳》（1941）和《朱门》（1952）等几本代表作。他自身的宗教文化思想很自然地融进这些创作之中。尽管这些作品大多用英文写作，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然而其根本价值在于它们从总体上表现了对于人类社会命运难以把握的种种悲哀和不断寻求这种把握的积极意识。这是林语堂许多作品、特别是他后期这些中长篇小说所潜在的深刻冲突和思想主题，也是其创作独特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相当系统地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熏染的一个。林语堂的父亲不仅是个虔敬的基督教徒，而且是当地的长老会牧师。这一家庭背景使他自幼即受到浓厚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在童年时就是一个热忱的教徒。从小学到大学，林语堂都是在充满神学气氛的教会学校度过的。这

^① 林如斯：《论〈京华烟云〉》，《林语堂文集》第1卷，第5页。

^② 林太乙：《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③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文集》第8卷，第327页。

^④ 林太乙：《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种独特的人生历程和教育过程奠定了林氏牢固的宗教文化思想基础，并致使他一度确立过为基督教而献身的理想。是日翻阅三书，深感于其对神学全宗 起初，林语堂对基督教神学的兴趣完全是出自家庭气氛的影响和父亲的引导，但随着眼界和学识的开阔，对基督教那套人生来就是罪恶的，不信教就要入地狱的赎罪学说开始反感和怀疑。他更愿意驱除基督教的神秘色彩，接受一种人道主义的宽容精神和广博的爱心。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在一次探家时应父亲之邀作过一次题为《把圣经像文学来读》的讲道。他提出：《旧约》应当作个体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则是出色的犹太神话和传说。他还特意强调：耶和华无非是一个部落之神，他帮助约书亚灭尽亚玛力人和基遍人。但是人们对上帝的想法演变了，从部落崇拜的偶像演变为一神教的上帝。在这通说道中，林语堂所倡扬的已不仅是圣经的文学意义，而简直是以无神论者的姿态表达出了对上帝的怀疑！^①

这种深厚的文化熏陶以及对这种文化深怀疑惑的矛盾很长时间伴随着林语堂，直到五四时期他才摆脱出来，相信人性本善，如果人类的爱要依赖在天的第三者，那么那种爱不是真爱。他转而信奉儒家，相信个人可以自己靠教育而趋于完善。这是他与基督教的一次分手。儒家文化究竟是不是宗教，历来多有争议，但除了汉儒时期，儒家没有宗教那种超自然的神迹、天堂和地狱，而更接近于西方人文主义，则很少有异议。实际上，林语堂就把儒家思想视为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学说。

但他后来愈来愈“发现”：“三十多年来，我惟一的宗教是人文主义，即相信人有理性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而只要知识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在观察 20 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和不信上帝的国家里发生的种种事态之后，我深信人文主义不够，深信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受自身以外、比人类更伟大的力量。”然而他又“开始感到不安”，又“对人文主义的信仰逐渐减低”。其间，他曾转向对东方的佛教与道教的思索，但认为佛教的“四大皆空，梦幻泡影”，太重来世、出世的观念和道教“教人尊敬‘无形’、‘无名’，不可捉摸而无所不在的道，也即上帝”以及教人“回归自然和对进步的警惕”等说教均“不能帮助现代人解决问题”。因此他再度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向童年时代的基督信仰。这次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再度

^① 林太乙：《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17 页。

皈依基督，竟使林语堂“重新发现耶稣的教训是简明纯洁得无以复加”，认为“没有人说过像耶稣那样充满怜悯的话：‘天父，宽宥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如此微妙玄通的话：‘你只要如此对待我这些兄弟中最卑微的人，你就等于如此对待我’”。林语堂似从中得到了“不可比拟的教训”，“极受感动”，认明“上帝不再是无形的，他经由耶稣变成了具体可見了——这就是完整、纯正的宗教，而不是假使的宗教。没有别的宗教令人具有这种对上帝的亲切感受。建立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基督教独有的性能”。^①

至此，林语堂走完了他的“信仰之旅”。纵观他从接受家庭自然的基督教熏染到自觉地追寻人文主义，再到更自觉地“深信”“比人类更伟大的力量”，看起来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思想轨迹，本质上也是中西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思想、道教思想在他身上互相共存、互相冲突、互相磨合的过程。

林语堂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儒家学说和道教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在中外文化的比较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独有所悟。他担当教堂牧师的父亲同时用四书、五经和《圣经》教育孩子，打下了林语堂“半东半西”、“亦孔亦耶”的文化志趣。因此从小开始，他就受到了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积极进取的思想的激励，也萌发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他到了西方，接触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后，对儒家学说的人文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人文学者尽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他们会悟了人生的真意义，因完全置学识的幻想于不顾”。“基督教义如当作一种生活方法看，可以感动中国人，但是基督教的教条和教理，将为孔教所击个粉碎，非由于孔教逻辑之优越，却由于孔教之普通感性的势力。”林语堂深感“中国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种程度的顽固的特性。中国的绘画或诗歌里头，容或有拟想幻想的存在，但在伦理学中，绝对没有非现实的拟想的成分。就是在绘画和诗歌中，仍富于纯粹而恳挚的爱悦寻常生活的显著征象，而幻想之

^① 林语堂：《信仰之旅》，1959年由Word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转引自林太乙《林语堂传》，第231—233页。

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笼罩一层优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图逃避此俗世也。无疑地中国人爱好此生命，爱好此尘世，无意舍弃此现实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他们爱悦此生命，虽此生命是如此惨愁，却又如此美丽，在这个生命中，快乐的时刻是无尚的瑰宝，因为他是不肯久留的过客”。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情态，林语堂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生理想之现实主义与其看重现世的特性源于孔氏之学说，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基督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教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为一实验哲学家；基督教为一慈善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孔子学说，干脆地说，不是宗教，它有一种对待人生与宇宙的思想，接近于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世界上有这样的伟人，他们不大感兴奋于未来的人生或生命不灭，或所谓神灵的世界等等问题。这样典型的哲学决不能满足日尔曼民族，因亦不能满足希伯来，可是他满足了中华民族。”^①

林语堂把孔门学说关于人在自然界所处地位的概念“天、地、人”比之于巴比伦之三重区别：超自然主义、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认为中外人文主义最能把握“自己在宇宙机构中之归属”，它“有如中国式的屋面而非歌德（Goth）式的尖塔，他的精神不是耸峙天际，却是披覆于地面。他的最大成功是在此尘世生活上能达到和谐而快乐的程度”。“中国式的屋顶指示出快乐的要素第一存在于家庭。的确，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人文主义好比是个家主妇；宗教好比女修道士；自然主义好比卖淫的娼妓。三者之中，主妇最为普通，最为淳朴，而最能满足人类”，“但是淳朴是不容易把握的，因为淳朴是伟大人物的美质。中华民族却已成就了这个简纯的理想，不是出于偷逸懒惰，而是出于积极地崇拜淳朴，或即所谓‘普通感性之信仰’。”在这里林语堂清楚地表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即他所称之为“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解、认同，甚至是崇拜。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的儒家哲学深为叹服，他认为中庸是一种很难的功夫，“介于动与静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逃避现实人生之间”，“这种哲学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理想了”。^②

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这些对儒家的解释，与正统儒家存在较大的不

^①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人生之理想》，《林语堂文集》第8卷，第101页。

^② 林太乙：《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同，充满着浓厚的道家文化思想色彩。不少学者认为，道家是从儒家中蜕变出来的，比如《论语》中的不少人物和言论，后世都被道家所信奉。李泽厚因而提出“儒道互补”这样一个命题。林语堂所理解的儒家文化思想，实际上融合了浓厚的道家思想成分在内。所以毫不奇怪，林氏特别喜欢李密庵的《半半歌》：“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①与中国其他现代作家相比，林语堂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长期居住国外，长期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这是他的一个明显“不足”。但这个不足却使他更亲近“儒道互补”的儒家学说。同时，也正由于身在国外，林语堂广泛接触到世界各种思潮，在这样一种“比较文化”的视野中，他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人文主义的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因而逐渐对道家学说发生了兴趣。

四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京华烟云》及其每部分作为题旨的庄子语录。《京华烟云》原译《瞬息京华》，“烟云”也好，“瞬息”也罢，无非是人生匆匆，世事沧桑。而书中所引庄子话录，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但其基本含义为：道之无时无所不在；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一定之规，善恶、美丑、荣辱、贵贱、死生、祸福，如朝去夕来、梦去旦醒，皆为轮回转换，不可强求，亦难以回避。这里带有浓郁的道家思想，虽然“仅仅从宿命论这一点难于判定《京华烟云》的基本思想乃是庄子的道学”^②，但道家的宿命论思想无疑是林语堂体认人生世事的一个出发点。

《京华烟云》从1900年秋八国联军进军京华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京华，叙述时间近40年。作品在这风雨飘摇、动荡不息的数十年间，展示了京城姚、曾两个富豪之家的生活变迁，命运沉浮。像这样以大时代为背景框架描述大家庭命运变幻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典到现代都不少见，况且《京华烟云》在结构甚至情节方面对《红楼梦》有着比较明显的模仿，并没有显示出自己多少总体性的创新特色。但《京华烟云》比较强烈地

^① 林太乙：《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29页。

^② 万平近：《林语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渲染和突出了人类命运的变幻莫测，全书沉浸 在一种“人自身之外的伟力”的神秘气氛之中。作品开头即于兵荒马乱之中，姚府由京城举家南逃；最后结尾则是姚府新一代的主人姚木兰一家仍然于兵荒马乱之中由杭州西逃。此部巨著以逃难始，复以逃难终，仿佛这几十年的历史就没有间断过逃难人群的仓惶步履。更耐人寻味的是，作品开头是姚木兰在逃难中与家人离散，被曾家收留；作品结局则是姚木兰在西行逃难途中又收留了三个孤儿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作品在总体构思上出现的这两组首尾互叠的场景，绝非偶然。它包含着作者的某种匠心。它强烈地传达出一个极富象征性的意蕴：人的命运浮沉漂零、悲欢离合，是多么难以自握！饱尝数十年人间冷暖、备受颠沛流离、骨肉分别之苦的姚木兰，她怀抱着的那个刚刚出生就不知将被命运抛向何方的婴儿是多么沉重！——她所抱着的实际上是自己一生巨大的不幸以及对这不幸的巨大困惑。

事实上，在贯穿《京华烟云》的主人公姚木兰身上正集中体现了浓厚的宿命论情结。从其一生的遭遇来看，她不仅“相信一个人的婚姻是受命运支配的”，而且相信人的整个命运都是自己无可支配的。在她身上更多地流露出对命运的一种近乎冷漠的容忍和承受，一种由对命运被动地顺从进而达到积极调理的心态。作品开篇就揭示出命运契机与姚木兰一生遭遇的巧合。姚家离京逃难之际，“木兰在选择车辆时，不是看着骡子好坏，而是取决于骡夫的样子”，这个偶然的选择竟招致不久木兰与家人的失散以至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在人的一生，有些细微之事，本来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过境迁之后，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这个年轻车夫若头上不生有疮疖，而木兰若不坐另外那辆套着瘦小骡子的轿车，途中发生的事情就会不一样，而木兰一生也就不同了。”作者精心设计的这个开局，从一开始就把主人公的命运推向一个难以预测的谜阵之中。木兰自幼同家人离散，虽然一路被人收留，最后幸运地作了儒家信徒曾文朴家的儿媳妇，又得到自家父亲特别丰厚的嫁妆，看起来依然是富贵荣华之命，但她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对命运飘忽不定的惊恐和疑虑。正因如此，虽然她受到一些新兴时尚的影响，在同学那里朦胧地了解到基督教“反对传统的有关妇女那套道德教条，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结婚制度”等新鲜主张，甚至接受了某些新思潮的洗礼，但是她更多地保持了旧式女性对命运的默认。有人认为，姚木兰仅是心地善良的富家妇女，并没有达到中国现代新女性的思想高度，在她身上最多体现出一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然而，